

doi:12.3969/j.issn.1672-0598.2012.02.018

康有为的资本主义判断和世界大同理想评价*

王海林¹,董四代^{1,2}

(1. 武夷学院 思政部; 2. 福建省统战文化研究基地; 福建 武夷山 354300)

摘要:在西方文明对中国强势冲击和“西学东渐”的历史背景下,康有为以进化论历史观认识人类社会发展,对西方资本主义进行判断,重新阐释传统大同理想,把对理想社会的追求从歌颂过去转化为面向未来,为中国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制度选择提供了文化前提。搞清中国人接受社会主义的思想前提,是认识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历史必然性的必要条件,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关键词:康有为;大同理想;资本主义判断;社会主义选择;历史评价

中图分类号:D69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0598(2012)02-0111-05

康有为以释古开新的方式追求中国近代社会变革,是近代史上著名的启蒙思想先驱。面对救亡图存的历史任务和国家现代化的理性诉求,在“西学东渐”的历史背景下,他接受进化论,以贯古通今、执中鉴西的学术风格,在借鉴西方文明过程中批判传统社会,提出自己的变革主张和社会理想,同时又以对西方资本主义的判断阐释中国传统理想,从人类社会发展的远景目标上否定了资本主义,为中国人接受社会主义提供了思想前提和文化基础。这其中虽有误读与局限,但更多地包含了思索和创造,研究和发掘其中命题的积极因素,对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借鉴价值。

一、康有为以历史进化论判断西方文明

自西方启蒙运动以来,资本主义把人类文明推向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但与之共生的各种冲突与社会矛盾也日益尖锐。当它们向中国发起进攻,中国传统社会发生深刻转型的时候,中国人一方面努力向西方学习,追求自尊自强,以挽救民族危机和实现国家独立;另一方面又通过对资本主义矛盾的分析,寻求不同于西方的社会发展道路,以振兴中华和实现民族复兴。康有为作为近代重要启蒙思想家,在吸收与借鉴西方现代文明的基础上,不仅提出了改革的预期设想和实施方案,而且创造性地阐释了中国传统社会理想,提出了人类走向世界大同的发展远景和终极目标,实

* [收稿日期]2012-01-13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项目(08JA710032)“传统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资源”

[作者简介]王海林(1980—),男,江西信丰人;硕士,武夷学院思政部教师,主要从事传统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董四代(1947—),男,河北蠡县人;武夷学院思政部暨福建省统战文化研究基地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研究。

现了传统社会理想的与时俱进,赋予其新的时代生命力。

19世纪后半叶是中国社会危机空前加剧,思想文化发展出现重大转折的时期。与社会全面转型相联系,资本主义文明挟带的经济、政治、文化对中国思想发展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特别是进化论思想在中国的兴起和广泛传播,改变着2000多年来传统社会“天不变道亦不变”的迂腐观念。如何实现中国发展与人类文明的和谐统一,最终趋向社会“大同”,成为历史提出的重大而紧迫的时代命题。这时,西方正面临资本主义矛盾日益凸显,工人运动此起彼伏,社会主义运动雄姿勃发的社会现实;这引起了先进中国人对它的高度关注,并使一些启蒙思想家超越西方自由、民主、平等和博爱的思维视野,从而在吸收借鉴社会主义思想中放眼世界和展望未来,借以批判封建主义,并依据人类文明发展趋势和中国社会历史要求,以进化历史观思考和阐述中国社会发展的制度选择和政策方案。

早在19世纪70年代,江南制造局编译的《西方近事汇编》一书中,就曾报道过英、法、德、美和西班牙等国工人罢工并同资产阶级对抗的系列消息。该书报道西方有人“创为贫富均财之说,欲藉其本境殷富,夺其资财,以予贫乏,是相率而出于乱也”^{[1]12-13};又说:“欧洲有‘莎舍尔德玛藹里会’(今译为社会民主党),译音‘平会’,欲天下一切平等,无贵贱贫富之分”^{[1]18}，“主欧罗巴大同”^{[1]12}、“贫富适均”^{[1]13}(社会主义学说的最初概括,编者注)。汪凤藻翻译了法思德著作《富国策》,在《论制产之义与均富之说》一文中评价欧文和傅立叶的思想时说:“贫富之不均,由于人之有私产。国愈富则愈不能均,天下古今之常势也。于是有创为均富之说者。”^{[1]28}1891—1892年,《万国公报》第35—39册连载美国空想社会主义者贝拉米的小说《回顾》(译作《回头看纪略》)。所有这些都对关注西方社会发展的人们产生了一定影响。

在《大同书》中,康有为认为:西方资本主义发展“虽使机器日出精奇,人民更加才智,政法更有精密,而不行大同之法,终无致生民之食安乐,

农人之得均养也。”^{[2]189}又说:“农不行大同则不能均产而有饥民”^{[2]188}，“工不行大同则工党业主相争,将成国乱”^{[2]189}，“商不行大同则人种生诈而多余货以殄物”^{[2]190}。他还说,“若工事之精,制造之奇,汽球登天,铁轨缩地,无线电之渡海,比之中古有若新世界矣。商运之大,轮船纷驰,物品交流,遍于五洲,皆创数千年未有之异境。文明日进,诚过畴昔。然新业虽瑰玮,不过世界之外观,于民生独人之困苦,公德之缺乏,未能略有补救也。”^{[2]188}资本主义竞争和垄断的本性使“贫富必不均而人格不平”,“为人民谋公益者,虽日谋之计之而无以为策也”^{[2]193},终酿成如此恶果:“资本家复得操纵轻重小工之口食而控制之或抑勒之,于是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矣”^{[2]189}。

他欧游十一国后,对资本主义内在矛盾体悟更加深刻,对西方各国现实评价道:“即欧美号称富盛,英国恤贫之费岁糜千万磅,而以工厂商本皆归大富,小本者不足营业,故贫者愈贫。进试观东伦敦之贫里,如游地狱,巴黎、纽约、芝加哥贫里亦然。”^{[2]27}与此同时,他还关注到了西方各国普遍兴起的反资本主义运动,认为:“夫人事之争,不平则鸣,乃势之自然也。故近年工人联党之争,挟制业主,腾跃于欧美,今不过萌蘖耳。又工党之结联,后此必愈甚,恐或酿铁血之祸,其争不在强弱之国而在贫富之群矣。从此百年,全地注目者必在于此。故近者人群之说益昌,均产之说益盛,乃为后此第一大论题也。”^{[2]190}一战后,启蒙运动给资本主义描绘的宏伟蓝图和传奇神话遭遇全面破产,西方社会发展日益陷入“悖论困境”,资本主义远未实现人类理想社会追求的共同愿景。

康有为发现,西方各国虽然比中国更文明发达,但也包含着自身难以克服的深层矛盾。在探讨中国发展前景时,他既主张学习西方文明、矢志变革图强,使中国迈入世界现代化发展的康庄大道;同时又强调关注西方社会的各种冲突和内在矛盾,寻求破解矛盾之法的传统文化资源。他的思想宗旨是依据进化论思想阐释人类文明发展趋势,通过借鉴西方文明,创新“大同”理想,借以批判传统弊端和判断资本主义,把中国人民对理想社会的探求从歌颂过去转化为面向未来,为后来

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的兴起和传播提供了文化前提,也为中国现代化道路的制度选择奠定了思想基础。

二、传统理想创新与中国现代化道路选择

对儒家思想进行创造性发挥,使之与现代文明和谐共生,在与时俱进中提出自己的变革主张和社会设想,是康有为思想启蒙和学术研究的突出特点。他根据历史进化论阐释《公羊》“三世说”,认为人类社会是依据“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之顺序渐进发展的,理想社会的蓝图不在尘封的过去而在遥远的未来。同时,他又以返古释今的方式,认为儒家思想精髓不是被封建统治者视为治国之经的古文经学,而是被社会边缘化了的今文经学,并根据今文经学,通过阐发孔子的“微言大义”,赋予儒家思想新的时代活力和实践特色。

人类的真理性认识通常不由一家思想所掌握,而往往是在各家思想的相互辉映中综合体现出来。《礼记·礼运》中关于大同社会的描述虽以儒家经典面目出现,但却以集中的方式表达了先秦各家的社会理想。康有为说:“读至《礼运》,乃浩然叹曰:‘孔子三世之变,大道之真,在是矣;大同小康之道,发之明而别之精,古今进化之故,神圣悯世之深,在是矣;相时而推施,并行而不悖,时圣之变通尽利,在是矣。是书也,孔氏之微言真传,万国之上无宝典,而天下群生之起死神方哉。’……二千五百年至予小子二鸿宝发现。辟新地以殖人民,揭明月以照修夜,以仁济天下,将纳大地生人于大同之域,令孔子之道大放光明,岂不异哉!”^[3]²³⁶康有为把“三世说”与历史进化论有机融合,认为社会是渐进发展的,最后趋向大同。

康有为以恢复儒家正统身份出现,以恢复孔子思想真意为手段,抨击“存天理,灭人欲”的封建纲常礼教,认为它“悖人性之至”,主张人道主义,并视之为人类公理。“人道者依人以为道。依人之道,苦乐而已,为人谋者,去苦以求乐而已,无他道矣。”^[2]¹⁵“普天之下,有生之徒,皆以求乐免苦而已,无他道矣。……人道无求苦去乐者

也。”^[2]¹⁶根据对西方的考察发表议论说:“欧美略近升平……其去公理远矣,其于求乐之道亦未至焉。神明圣王孔子早虑之忧之,故立三统三世之法,据乱之后,易以升平、太平,小康之后,进以大同”^[2]¹⁷,认为这才是孔子思想核心和灵魂。又说:“吾既生乱世,目击道苦,而思有以救之,昧昧我思,其惟行大同太平之道哉!遍观世法,舍大同之道而欲救生人之苦,求其大乐,殆无由也。大同之道,至平也,至公也,至仁也,治之至也,虽有善道,无以加此矣”^[2]¹⁷,认为欲拯救人的苦难,必须行太平之道、施大同之法,除此别无他法。

作为东方启蒙思想家,康有为认为通往大同之径关键在于倡导儒家仁爱精神,并对达尔文“生存竞争、优胜劣汰”的进化论思想进行了全面批判。“其妄谬而有一知半解如达尔文者,则创天演之说,以为天之使然,导人以竞争为大义,于是竞争为古今世界公共之至恶物者,遂揭日月而行,贤者皆奉之而不耻。于是全地莽莽,皆为铁血,此其大罪过于洪水甚矣。夫天演者,无知之物也,人义者,有性识之物也;人道所以合群,所以能太平者,以其本有爱质而扩充之,因以裁成天道,辅相天宜,而止于至善,极于大同,乃能大众得其利乐。”^[2]²³⁰⁻²³¹他把人类社会发展分为“据乱世”、“升平世”和“大同世”,认为:“据乱之世,人尚私争,升平之世,人人各有度量分界,人不加我,我不加人。故大同之世,视人如己,无有畛域,‘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2]²³¹他主张超越“据乱世”和“升平世”的尚武竞力,努力实现尚智竞仁的大同社会;惟其如此,方能实现人人自由平等、生活幸福和谐、社会公正有序、人与自然天人合一。

为维护中国的文化尊严和文化自信,康有为认为唯有中国的大同思想,才能医治现实世界之贫富悬殊、民生凋敝,道德沦丧、伦理失范,弱肉强食、治理失序,彻底消除资本主义的矛盾和弊端,引领社会发展趋于至善至美,实现人类社会理想的终极追求。他认为,虽然资本主义创造了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伟大奇迹,但也造成了现实社会的诸多“悖论”困境,只能称之为“升平世”。大同思想本来是以歌颂唐虞三代的复古主义反对现

实,但康有为创新传统并借题发挥,使大同思想超越了自然经济的狭隘视域,在放眼世界、展望未来和面向现代化中形成了新的生命活力。德国学者鲍吾刚说:“哲人康有为被称为‘满清近代以来最重要的思想家’,而且他也无可争议地是中国复杂的‘乌托邦’思想最具权威性的人物。如同聚光镜一般,古老中国光辉的政治宗教思想集中体现在他的人格当中,而且经过全新科学思想的折射后,其思想传播影响至今仍然不减。”^{[4]345}

三、对康有为世界大同思想的历史评价

康有为虽然提出了世界大同理想,但并没有提到社会主义的概念,梁启超却把他的大同思想与社会主义相贯通,认为:“先生之哲学,社会主义派哲学也。泰西社会主义,源于希腊之柏拉图,有共产之论。及十八世纪,桑士蒙、康德之徒大倡之,其组织渐完备,隐然为政治上一潜势力。先生未尝读诸氏之书,而其理想与之闾合者甚多。”^{[5]750}他依据人类文明发展大势,发掘传统文化资源,借以创新传统理想、判断资本主义和阐释社会主义,把康有为大同思想与社会主义实现了对接与会通。

康有为的大同思想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重要成果,但对其评价历来褒贬不一。改革开放前,由于政治环境的影响,学界一般认定康为是“改良主义者”,斥责其为改良主义之上的空想或视为美化资本主义的乌托邦,其思想中的真知灼见不屑一顾。在全面推进小康社会与和谐社会,小康、和谐、民生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关键术语后,就有必要回溯历史、反思当下和展望未来,探究它们是怎样从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中保持时代生命力的,这就绕不过康有为的大同思想。

首先,它发掘中国传统文化资源,实现了社会主义思想与中国传统理想的会通。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提出过“轴心期”命题,认为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提出的许多命题不仅深刻而且有一种历史生命力。“直至今日,人类一直靠轴心期产生、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燃火焰。”^{[6]14}域外思想“本土化”,首先必须从传统中寻找思想文

化资源。《礼记·礼运》中“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是一个历史“轴心期命题”。康有为大同思想既体现了对现实的强烈批判,又与传统理想相贯通,从而在中国时代变革和社会发展中保持了永恒的生命力。不论是早期国民党人对社会主义的理解,还是共产党人对科学社会主义的再创造,都是围绕对大同理想的追求而展开的,康有为把大同理想与社会主义统一起来,也就为中国人接受社会主义提供了思想前提。

其次,大同思想体现对当下的超越批判,为中国现代化确立了长远目标和精神动力。20世纪初的西方,资本主义出现贫富悬殊和社会动荡,现代性悖论已不是“隔岸观火”。康有为认为世界大同是人类文明发展的终极目标,小康社会是当下现实的应然选择。这一理念为中国现代化规定了新目标,树立了新范式、确立了新准则,使小康、和谐、民生等传统命题转化到现代化进程中,又使大同理想作为内在的超越批判和精神动力,省视当下之不足,并从事改变现实的实践活动。美国学者乔·奥·赫茨说:“指南星并不因为永远不能达到而失去其指南的作用。”^{[7]266-267}人们历来批判康有为大同思想是乌托邦,但乌托邦作为一种内在的批判力量,不仅对现代性悖论进行批判,而且是社会主义追求的一种精神动力。乌托邦“鼓励人们大胆探索并追求更加美好永远美好的事物的精神,使人们超越现实世界的限制,向往社会实验。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防止停滞不前并保证社会的进步。”^{[7]259}

再次,它在传统文化创新中为科学社会主义中国化奠定了思想基础和文化前提。恩格斯说社会主义“同任何新的学说一样,它必须首先从已有的思想资料中出发,虽然它的根子深深扎在物质的经济的事实中。”^{[8]719}康有为大同思想是为适应现代文明发展而阐发的独立思想体系,综合了先秦各家社会理想、佛教基督教平等思想、达尔文进化论、柏拉图乌托邦思想和空想社会主义学说。贺麟说:“任何一个现代的新思想,如果与过去的文化完全没有关系,便犹如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绝不能源远流长,根深蒂固。”^{[9]4}近代西方文明对中国传统强力冲击,社会急剧转型,康有为以执中

鉴西的学术风格,不仅追溯传统理想的历史嬗变,而且提出超越资本主义的目标,把资本主义批判与传统理想阐释有机结合,实现了大同理想与社会主义的成功对接,这消除了中国人民接受社会主义的思维障碍,为社会主义术语和理论“本土化”奠定了基础。萧公权认为:“康显然将西方思想译成汉语,又以外国词汇演绎传统的儒家思想。因此,大同的思想和情怀,与近代西方及儒家中国都有亲近的关系。”^{[10]338}

[参考文献]

- [1] 姜义华. 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的初期传播[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1984.
- [2] 康有为. 大同书[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9.
- [3] 康有为. 孟子微 礼运注 中庸注[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7.
- [4] [德]鲍吾刚. 中国人的幸福观[M]. 严蓓雯, 等译.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4.
- [5] 易鑫鼎. 梁启超选集(下卷)[M].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6.
- [6] [德]卡尔·雅斯贝尔斯. 历史的起源与目标[M]. 魏楚雄, 译. 北京: 华夏出版社, 1989.
- [7] [美]乔·奥·赫茨勒. 乌托邦思想史[M]. 张兆麟等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0.
- [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 [9] 贺麟. 文化与人生[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6.
- [10] [美]萧公权. 康有为思想研究[M]. 汪荣祖, 译.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05.

(责任编辑:朱德东)

The Judgment on Kang Youwei's Capitalism and Evaluation on Datong Ideal of the World

WANG Hai-lin¹, DONG Si-dai^{1,2}

(1. Department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Wuyi University, Fujian Wuyishan 354300, China; 2. Research Institute of the United Front Culture in Fujian Province, Fujian Wuyishan 354300, China)

Abstract: Under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of strong impact of Western civilization on China and the “introduction of Western politics to the east”, Kang Youwei used historic conception of evolution theory to recognize human society development, carried on the judgment on the West capitalism, re-interpreted the traditional social ideal of Datong, made the pursuit of an ideal society transform from extolling the past to facing the future, which provided the cultural premise for the choice of socialist system of China modernization. Clarifying the cultural premise for Chinese to accept the socialism was the essential condition of the historical inevitability for China to follow the socialist road and is of important reference significance to constructing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to building harmonious society.

Key words: Kang Youwei; Datong ideal; capitalism judgment; socialism choice; historical evaluation